



“甘味出陇”的历史故事

□ 史 勇

七月,一年一度的兰洽会如约而至。在兰洽会上,我省各市州精心打造的“甘味”农产品集体亮相,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展现着地道“甘味”的独特魅力。“甘味”,取名于甘肃之“甘”,取意于“甘”美之“味”。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连接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具有承东启西、南拓北展的区位优势。在古代,就有不少地道“甘货”走向世界。外国使节或商队返程时,往往会采购若干甘肃土特产运往中亚以至欧洲,浓郁的“甘味”随着商贸活动四海飘香。及至近代,甘肃特色农产品亦行销国内外,有的还声名远播;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名优农副产品更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不论是现在,还是古代,浓浓“甘味”早已香飘各地。



▲兰州百合
►陇南黑木耳

早在秦代,即有民间行商将今甘肃部分地区和中原的土特产品转手销售给匈奴和西域商人。随着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开通,西汉王朝通西域的经济目的,除了获得骏马外,为中原的绢丝等物产开辟外销渠道也是重要驱动力,“武帝之向西开拓,原为谋取国外市场,其派使出兵为开发经济市场之计划,正不下於远交近攻之军事作用也。”(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与此同时,亦向私商发放“符传”,有限度允许民间与西域商贾交易不在禁例的土特产。两汉时期,除了官方及有执照的合法私商之外,河西走廊上的民间外贸活动亦颇兴盛,民国时期有学者指出:“中国商品之输入西域诸国也,由汉提携往者固多;然由边地居民潜行运往者亦颇不少。”

曹魏时期,以仓慈为代表的历任敦煌太守,着力为“甘味出陇”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据《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记载,当时的敦煌地方官员和商界除了热情接待西域商人外,还积极为他们推荐和采办包括甘肃土特产在内的中原商品,并派人护送出境,西域商人对此纷纷称赞。

十六国时期,西域商人多以敦煌、张掖、武威为贸易终点,回程时大量采购甘肃土特产西返。隋代,隋炀帝不仅指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主管丝路贸易事务,而且亲自出巡河西召开“万国博览会”,西域各国国王、使者和商人纷

纷前往谒见;虽然隋炀帝意在向西域诸国宣扬“威德远播”,但此举一定意义上也算是“国际层面的招商引资大会”,此后西域各国使者和商队经甘肃往返中原者日益增多,并且享受交通食宿方面的优惠待遇。《资治通鉴》载:“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期,“商业中心以河西诸郡为最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味”在全世界更广泛地传播。

明代的肃州城为西方商贾汇聚之地,甘肃特产中药材备受青睐。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自肃州运输大批大黄至意大利威尼斯销售。为了将“甘味”中药材运至欧洲,波斯商人也是不辞辛劳。据文献记载,当时自肃州至讨来思大城(今伊朗大不里士)这段行程需要169天,其中肃州至喀什噶尔沿途“皆经荒凉沙漠中”。到了清代,甘肃等省优质野生大黄更被视为战略物资,“清代沿边督臣章奏,常有禁绝茶叶大黄,可以制外夷人之命等语”(侯厚培:《中国国际贸易小史》),可见,那时的外国人想体验一下“甘味”土特产,还得受诸多因素限制。

19世纪50年代以后,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肃州设领事、辟商埠,试图将河西走廊变为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清末民初,英

德等国洋行纷纷在甘肃临夏、甘南等地通过代理人收购羊毛、皮张、药材等土特产品,经黄河水运至包头,再以火车运至天津出口。随着民族工商业的逐渐兴起,特色农副产品对于甘肃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申报》记者陈庚雅20世纪30年代初在甘肃考察,其著《西北视察记》中曾指出“甘肃幅员辽阔,宝藏极丰,特产物品,尤为繁夥”,并总结了行销平津沪及东南各省的多达23种“甘味”土特产,包括毛皮、药材、珍稀动植物、瓜果水产、水烟等。

据其引用1933年度商会调查数据,“甘味出陇”以中药材为代表,如临潭、岷县各县所产大黄、当归三千四百担,每担价值二百四十元,共值八十一万六千元,运销津沪等地。

彼时另外一类“甘味出陇”的大宗商品则是著名的甘肃水烟,1933年度数据显示,“皋兰、榆中、临洮、靖远各县产造条棉水烟三万五千担,每担价值一百元,共值三百五十万元,运销津沪川新等处。”兰州水烟业发轫于明末,清朝时趋盛,以五泉红泥沟所产烟叶驰名,兰州水烟系将烟叶加工成细丝,加入药料炮制而成,分为棉烟、碧条、黄烟三种,炮制方法及用料各异,棉烟主销四川,碧条主销江浙,黄烟主销广东。

清末民初,兰州水烟或由黄河羊皮筏水运出省,或由陕西泾阳运至汉口,再由长江水路

东运下游各省、南运广东等省。由于兰州水烟外销数量巨大,沿途各省往往将这类“甘味出陇”商品视为地方税源之一。如湖北当局曾规定兰州水烟过境税标准:“兰州青条烟,每斤征钱二十文,过境兰州水烟大箱征钱二串,小箱一串二百文”。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对外经贸体系,许多传统名优土特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登上国际舞台出口创汇。其中与“甘味出陇”“甘味出海”有关的农产品包括金针菜(黄花菜)、黑瓜子、白瓜子、发菜、核桃仁、苦杏仁、辣椒干、蜂蜜、小茴香、花牛苹果、白兰瓜、蕨菜及蕨菜干、杏、桃、大蒜、沙棘等;中药材包括当归、党参、甘草、大黄、红芪及相关中成药等(《甘肃省志·外经贸志》)。

地方文献中亦不乏“甘味出陇”“甘味出海”获得赞誉的相关记载。如甘谷线辣椒一直是甘肃省名特优农产品。改革开放初期,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斯里兰卡、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9年9月,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农业教育与科技》栏目组专程



赴甘谷采访拍摄《甘谷线辣椒》电视专题片并向全国播放。又如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镇原杏仁以“仁大、色正、味纯、饱满、质优”驰名全国,1976年受到外贸部门奖励,1978年全国农产品现场会上以出口量大、质量好位列全国第三。改革开放后,镇原县将原酒厂改造为果品厂,甘草杏、奶油杏肉、果丹皮等系列产品畅销全国23个省区市,相关产品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铜奖。

进入新世纪,在出口贸易带动下,借助大型贸易博览会等重要平台,小杂粮逐渐成为“甘味出海”的重要产品。据媒体报道,第110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幕仅3天,甘肃省主推的荞麦、荞麦米、苦荞茶等就签订了上百万美元的出口合同。

回顾这些往事,不难看出,“甘味出陇”“甘味出海”可谓历史悠久,在国内外亦有良好口碑和较为深厚的市场基础。

兰州水车,黄河之畔的美丽风景

□ 邓 明

“水车旋转自轮回,倒雪翻银九曲隈。始信青莲诗句巧,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清道光年间诗人叶礼,在看到兰州“城楼与水车相映”之景后所作的诗,由此可见当时兰州黄河水车的盛景。

据记载,兰州周边共有300多辆水车,至20世纪50年代仅黄河兰州段仍有水车252辆。这些水车沿黄河串联在一起,成为黄河沿岸壮丽的景观。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电力灌溉技术普遍应用,兰州水车数量逐年减少,也渐渐地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这些古老的水车留下了悠久的历史印记,它们不仅是农业工具,更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民智慧和勤劳的象征。



兰州水车博览园内的水车。马伊星(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水车又名天车,或称挑车、翻车、筒车、老虎车等,曾经作为人们提水灌田的生产工具,在农业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兰州水车历史悠久,是古代黄河沿岸古老的提灌工具,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明朝进士、兰州人段续任湖广参议时,曾在安陆督修显陵,利用当地的筒车原理,结合黄河水急等特点,经过反复试制,于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后成功制成黄河水车,而后黄河两岸农民争相仿制。段续创制兰州水车后,历经近400年的发展,到1952年,黄河两岸共有250多辆水车,蔚为壮观,成为兰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兰州也被誉为“水车之都”。

昔日,兰州黄河两岸以及夹河滩上,隔不远距离就有高大的水车,不断旋转,倒挽河水。车轴吱吱作响,水筒哗哗倾注,车下细雨霏霏,彩虹道道。车身黑湿,绿苔斑斑,掩映在槐柳梨树组成的绿带中,诗意自然流淌。

清乾隆年间兰州举人江得荇官华阴学正,思念故乡风物,赋《我忆兰州好》十二首。其中的第二首描绘夏季景观,忆念水车: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坞,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

凉意沁诗脾。

诗人先写盛夏黄河之滨莲荡池等园林胜景作铺垫,最后归结到夜晚纳凉河滨,轧轧水车旋转,引发诗意,可谓曲婉多姿。

清光绪年间青城(今属榆中县)副贡金炼写了《翻水车赋》,其中的佳句有:

轮因回以引水,地有轴以随天。个个飘翻,激惊涛兮百尺;护环回转,泊银浪兮长年。盖其为制也,如南斗之挹酒泉;其运构也,如北辰之转轮廊。其去势之蜿蜒也,若戏水之游龙;其随形夫转侧也,若盘天之野鹤。尔乃板压波心,瀑垂云窟,斜挂长虹,定捞明月。昼而望之,晴亦风雨;仰而观之,高凌巍峨。

文中用典雅的文字,生动的比喻,营造了水车倒挽河水的唯美意境。

水车还是造型艺术家喜爱的题材。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绘的《金城揽胜图》中画了两架水车:一为陕甘总督署城北的水车,渡槽越北城而过,浇灌节园,兼为附近居民供水;一为兰州新关(今广武门)外的老虎车。清末兰州山水画家温晓舟创作了“兰州八景”,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莲池夜月》。莲池是莲荡池,也叫小西湖,为明肃王所辟园

林。画面中,圆月高照,如带黄河与逶迤城墙之间,为一泓湖泊,菡萏竟放,扁舟泛月,垂柳苇荻围湖而生,月朦朦,烟茫茫,静谧幽雅,充满诗意。而河边一架水车在旋转,顿使画面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1935年,甘肃省平市官钱局发行了一套绘有兰州风物的钞票。其中一张面值五角的钞票以水车为题材:白云飘动的蓝天下,3辆水车并列为一组,矗立在红黄色的黄河之滨,高大雄伟,几乎占画面的六分之五空间,极具视觉冲击力。此为水车园的3辆水车。

20世纪30年代,兰州刺绣作品中,有以水车为题材的。高大的水车,汹涌的黄河,绿树掩映中的农田,用极

细腻的针法绣制,色彩绚丽,有如浅浮雕,具有立体感。抗战胜利后,避居大后方兰州的东南人士纷纷东下返乡,精明的照相馆老板,不失时机地推出一套兰州风物照片,裱在硬纸板上,便于陈列、玩赏。其中的水车照片,有3辆一组的、5辆一组的,无不拍出兰州水车的神韵,被返乡者带回故乡,寄寓客居兰州的情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用油画、水彩画、国画、版画为兰州水车造像的作品甚多,多有精品。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一些西方人在晚清拍摄的包括兰州水车在内的兰州风物的照片纷纷被发现。其中有英国人伯雅斯基于1814年拍摄的陕甘总督署北城外的水车,俄国人科兹洛夫于

1909年拍摄的郊外水车。

兰州还有一系列以水车命名的地名。金昌路北端、平凉路北端之间,叫“水车园”。金昌路口有一架水车,为清代举人虎文炳所建,故称“老虎车”。这架水车共灌溉600多亩地,多为果园菜地,故名“水车园”。此地1949年以后为光辉农业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起楼群,不少农民转而进入光辉布料批发市场等就业。今南滨河东路与天水路交接路口附近,20世纪70年代尚为黄河南河道——校场河,小地名叫“十辆车”,但仅剩5辆一组的水车,其北水面遗留木桩,当系另外5辆的残留。清代这10辆水车灌溉“泥窝子”(今宁卧庄)一带的良田900多亩。水车

亦有局限性:“遇旱则水落而车空悬,遇涝则水涨而车漂没,必水势得平,车机乃能无滞。”(《重修皋兰县志·水利》载)。清末一场黄河洪水,将5辆冲走,只剩5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倒挽河水灌田,成了绘画和摄影的素材。皋兰县什川镇有“上车村”“下车村”,此即由上游水车、下游水车而得名。红古区水车湾地处湟水转弯处,因有4辆水车倒挽湟水灌田,故名。还有“练家车”“刘家车”“王家车”等小地名,均为某家族所建水车而得名。

如今,在兰州市黄河风情线上,黄河水车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景观之一,这些遗存下来的黄河水车,再现了“水车之都”的风采,也是兰州人心中抹不去的水车记忆。